

拉着城市去看病

当一座城市为了抗击疫情不得不开始沉睡时,它的神经末梢依旧保持着活跃和敏感。对于这一点,武汉的网约车司机李捷十分了解。

他平均每天出车两到三次,车轮上维系的是这个城市最日常却又最急迫的需求——有高血压病人急需买药、有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着透析。一位糖尿病并发症严重、继发烂足的老人本该每3天去医院换一次药,但是因为疫情暴发,出行不便,等到李捷去接他时,他已经8天没有换药了,病足几乎腐烂。

李捷只是这个神经末梢上的一分子。1月26日0时,为防控新冠肺炎,除许可车辆外,武汉中心城区实施机动车全面禁行。1月23日,公共交通已先行被暂停。禁行后,有关部门从网约车和出租车公司处召集司机车辆,组建了大约6000辆车的“社区保障车队”,分配至城区1159个社区,保障非发热疾病紧急送医等居民必需出行,协助社区运送物资,为行动不便住户送菜、送药。

除了“社区保障车队”,从除夕至今,出行企业搭建了“医疗保障车队”,武汉市民也自发组建起志愿者车队。他们与300辆公交车,部分政府车辆一道,保证着医务人员出行。

在这个疫情依然严重的城市,这些穿梭于街道上的司机大多并没有充足的防护设备,大部分人都需要把用过的防护设备消毒、悬挂,反复使用,有人甚至将同一件防护服连穿10天。但迄今为止,很少有人退出志愿队伍。

一位本地司机说:“我太清楚这城市此刻在发生什么。你问我害不害怕?我当然害怕。但我必须出来,这是我自己的家园……”

另一位司机告诉记者,她只希望这个城市早点好起来,然后她才能好好去挣钱,正常生活。

和我妹妹一样的孩子

和李捷同属社区保障车队的滴滴出行网约车司机王莉说,除夕那天,妹妹从老家打来了电话。妹妹是护士,很多同学在武汉协和医院工作。她说:姐姐你要保护好自己,同学们都说快撑不住了。电话这头,王莉默默哭了,决定做点什么。她想到网上那些医生护士脸上被勒出印子的图片,“是些和我妹妹一样的孩子”。

后来成为滴滴出行武汉抗疫调度负责人的曾洪波记得,“封城”后,自己很快接到来自政府部门的要求:调集1300多辆车保障社区。1000多辆车几乎一夜间凑齐了。看到网上有大量医务人员因无法出行而求助,这家公司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,组建一支200多人的“医疗保障车队”。

李捷所属的网约车租赁公司一共有70多名司机,“30多个加入了保障车队,另外30个报名了没选上,还有十几个家在外省市,已经回家了,都嚷嚷着要回来。”

除此之外,武汉的私家车主汪奇和一些民间志愿者也已经活动起来。运送医务人员、转运物资,“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”。但他也承认,头两天内心很慌,一是不清楚疫情究竟有多恶劣,二是群内需要帮助的医务人员似乎太多了。

“在群里发一句话,5分钟不看手机,根本找不到在哪儿。”汪奇说,医务人员坐车的诉求几乎刷屏,到处都在求助。有时一个医生需要坐车,好几人回复,大家彼此又看不清——等到开车过去,发现人已经被接走了。

汪奇说,仅仅在他所活跃的十几个群中,估计就有不下1000辆市民自发提供的志愿车辆。

运送的医务人员里,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20多岁的护

士。她的爱人是医生,两人都上了一条线。刚满月的孩子被送回了老家。但孩子需要喝的那种奶粉在老家根本买不到,这位护士一直在通话,向各方亲友求助。事情一直解决不了,她在后座哭了起来。汪奇也沉默着抹眼泪。

加入“医疗保障车队”的滴滴网约车司机胡建斌接到的第二位乘客,便是一位深夜从武汉协和医院下班的护士。年轻的女孩上车后有些发愣,一言不发。胡建斌便问她,工作累吗?女孩猛醒过来,说在医院4天了,连轴转,一直没休息,然后便嚎啕大哭。

我不可能不怕 但总有人需要我

曾洪波称,据他了解,医务人员出行目前基本得到了满足。他们一部分被安排入住医院宿舍和附近酒店,政府和医院给予了部分通勤车辆,出租车、网约车公司和民间志愿者也提供着保障。

社区保障车队同样开始运转。王莉要每天6点多起床,驾车30多公里,从武汉黄陂区赶到被分配的武昌区社区。她告诉记者,小区目前秩序不错,“很少有全部配车都在外面的情况”。

李捷和王莉都说,自己所在的社区算不上繁忙的。他们说,武汉有一些居民达数万人的社区,或是那些老旧小区——它们没有电梯,老年住户又多,都增添了出行的需求与难度。据他们所知,这些社区的司机每天都很忙。

被分配去运送那位糖尿病并发症严重的老人就医换药时,李捷准时到达了。他本以为老人会有家人陪护,却发现老人拄着单拐,扶着楼梯扶手,满头大汗,从六楼一步步挪下来,疼到脸色惨白。



武汉市民近日自发组成志愿者团体,援助医务一线



近半个月,武汉市民志愿者汪奇驾车行驶于武汉大街小巷,协助运送医务人员和物资

老人告诉李捷,他的孩子都在海外,“封城”时妻子恰在其他城市。他的左脚因为换药拖延而溃烂,基本不能着地。李捷将老人扶进医院,医生告知,医院目前已被征用,无法处理其他病症。他只得将老人送回家,换上楼。两天后,再带老人去民营诊所换药。最后离开时,老人紧紧抓着李捷的衣服,不停地道谢。

倘若患病老人、孤寡老人是目前最需要照顾的人群,据王莉观察,需要社区派车帮助出行的第二大群体,是那些自我怀疑可能感染的居民。他们并未发烧,不算疑似病例,但自感各种不适:比如咳嗽、胸闷,希望去医院排查。王莉称,这部分人占到社区出行诉求的30%甚至40%。

“对于这种居民,社区会和我们商量:是否接送,选择权在司机。”王莉说,“一般我们不忍心,都还是出车,只是自己保护得严实点。类似情况很多,大多还是老人,身体弱,又不算疑似,120管不过来。”

但对于已经发烧的居民,依据目前规定,为避免交叉感染,应急保障车辆通常不能运送。社区只能将信息上报,等待医疗系统派车收治。

王莉在司机群里也会偶尔看到,一些社区情况堪忧,工作人员会要求负责社区保障的司机运送高度疑似的患者。这往往令司机陷入恐慌。

她曾接过一位中年女性,刚在医院处理完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母亲的后事。穿防护服的王莉一度有些担忧,但她很快发现,同样裹在防护服里的乘客身体绷得笔直,似乎也紧张到极点。车厢里没有人说话,只有那女人

在防护服里默默啜泣、颤抖。

社区和医护保障车队如今面临着相同的问题:防护服不够,都只能循环利用。滴滴出行总裁柳青一度发微博公开求助。曾洪波承认,公司目前还能能为司机提供充足的口罩和消毒液,但防护服已十分紧张。

相较下,汪奇这些民间志愿者的防护更为简陋。他们的一件防护服要连续穿两三天,没有N95口罩,每天戴普通医用口罩出车。2月3日,武汉当地一位名叫何辉的车队志愿者便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。

“这件事让大家有点受打击。”汪奇说,“但没人退出车队。”

对于加入志愿车队,李捷一直对家人有所隐瞒。报名那天,他把决心告诉家人,遭到一致反对。他13岁的孩子用手指着他,什么都不说,默默流眼泪。李捷向他们撒谎,自己只为社区送货,一个人都不接触,没啥危险。

李捷其实也担心。他是顶梁柱,家里又有孩子,他不敢想象自己万一感染的后果。“我不可能不怕,但总有人需要我啊。”

刚上路那几天,汪奇总担心违反禁令,被交警查扣。因此他总是拍下每一趟运送的医务人员们的工牌,或是物资的收据。警察每每拦住他们,汪奇就给他们看这些。然后对方就开始反复地说,你们太好了!一定要注意安全啊!

不止一次,汪奇从后视镜看到,车辆放行后,警察就这么站在原地,对着驶远的他们敬礼。

我就是它的一部分

王莉所在社区有4辆配

车,两辆是网约车,两辆是出租车。几天下来,原本在路上“水火不容”的双方就成了朋友。每次出车回来,开出租车的大爷不时招呼她,赶快过来,我给你消毒。

乘客们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。“以前人们打车,更多是觉得我付钱了,你得伺候好。”现在,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说“谢谢”。

几天前,王莉运送一位80多岁的老人去医院拆线。到达后,老人站在医院门口,迟迟不肯离开,非要帮助王莉倒车,替她看路。

“这段时间,老人真的很无助。”王莉说,她几乎能从乘车外出的每一位老人身上都感受到恐惧、担忧。那位80多岁的老爷爷也一样。陪他出来的女儿明显很不耐烦,老人在车上也一直沉默,看起来充满愧疚,但又一定要王莉开走后才肯去看病。

汪奇说,最初几天,他每天要运送十几拨儿医务人员,而且往往是一位医生叫车,挤上车的却是一群人。自从武汉组织了医疗保障车队,政府和几家出行公司介入后,需要民间志愿者接送的医务人员越来越少了。

“现在我每天大概只接送两趟。”他表示,目前除了保障极少数路途遥远或是下班很晚的医务人员出行,民间志愿者大多时间都在运送物资。

“2月以来,形势在慢慢变好。”汪奇回忆,春节那几天,能明显感受到医务人员们的恐慌。医务工作者们有的上车就累得睡着;有的在手机上飞快地敲字,手不住发抖;还有人紧紧抱头,唉声叹气。有人和汪奇说,他们缺乏物资,几乎就要裸奔;也有医生和他形容,就像是洪水来了,根本不知道怎么办,必须拿肉身去挡。

这些情景大概从1月底开始改变。随着支援赶来,医生们反映,物资紧缺的程度减轻了;人手也在增多,医务人员渐渐可以轮班休息。几天来,汪奇听到最多的话便是“现在强多了”。他感觉医务人员的精神渐渐好了起来,至少大家会笑一笑。

汪奇的车里开始多出各种东西,它们都是坐车的医务人员们留下的。有的医生看汪奇等人的防护措施过于简陋,悄悄将自己的N95口罩塞到他们的车座后面;也有一早乘车的护士,提前在家做好了早饭,下车时将牛奶、鸡蛋和面包一股脑地塞进汪奇怀里。

有一天,王莉和她服务社区的保安聊天。保安大叔很平淡地说,自己女儿科室4个人,3个都感染了,就剩下她自己。现在,她要去支援“火神山”了。

“过去没遇到大事,我从来不相信‘城市由我建设’。我说这就是空话。”王莉说,“现在,我觉得武汉就是我的家。我就是它的一部分。”

(据《中国青年报》)